

“大语文”的旗由谁来扛



□ 谷泽

注资、融资、卡位、竞争……近日，“大语文”培训机构消息不断，引发公众和媒体对“大语文”的关注与反思：“大语文”是否是伪概念，语文学习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大语文”方向何在，等等。

“大语文”当然不是伪概念。追溯源头，新中国成立前后，叶圣陶先生把国语和国文合起来称之为“语文”，这个定义，从叶老的初衷上来讲，其实已经指向大语文。可惜的是在后续的学科、教材、教法建设上，因为思想解放不足和照搬苏联教育方法等时代影响，语文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不仅没有展现其应有的“大”的一面，而且不时陷入政治化语文、低幼化语文、工具化语文等境地，格局

上被批评为狭窄，面上被诟病为支离，甚至在世纪之交被一篇名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文章刷屏，最终掀起新一轮课改的大幕。

从“大语文”概念本身来说也已经存在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河北省特级教师张孝纯提出要以语文课堂教学为核心，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提出大语文学习“一体两翼”的理论，即以语文课堂学习为主体，以加强语文课外学习和拓宽语文学习环境为两翼。经过张孝纯以及众多老师的探索，大语文教学流派在上世纪末期已经形成一定声势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事实上，新一轮课程改革在语文教学上更加注重人文性，更注重对整体性和综合性，更强调探究性，可以说都包含了包括“大语文”在内的多种语文改革探索的影子。

新课改起，“大语文”等改革融入新课改的大潮之中，加之语文改革新名词新理念不断涌现，原来以张孝纯为代表的“大语文”流派渐趋于沉寂。待到“大语文”近十年来重新回归公众视野，早已物是人非，名实乖离。现在见诸报端以及市面流行的“大语文”，已经成为众多语文校外培训机构的集体自称，同当时张孝纯所倡导的“大语文”已经无甚渊源。

无甚渊源本也无关系紧要，问题是目前的“大语文”校外培训机构常常呈两极之势：一是有“大语文”之名，但完全无“大”之实，依然以提分为唯一目标，大行之前数学英语补

习班的生意之道，影响学校教育秩序，负面效应显著。二是有“大语文”之名，也有“大”之实，但是大而不清，大而无边，或打着国学、游学、演讲等名目，既无课程、更无体系、也无师资，和“语文”相去甚远。

疫情以来，大量的风投资金涌入“大语文”赛道，各家机构开始纷纷抢滩布局“大语文”，有研究机构称，2020年语文培训市场规模2000亿元左右，市场增长潜力大。这就造成一方面培训机构之间互相竞争激烈，不当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用商业的模式把语文当成生意来进行扩张，尤其是当前一些头部机构纷纷斥巨资进行扩张，其商业本性极易破坏教育风气和生态，裹挟家长和学，令“疯狂的黄庄”的风险再现。

当前教育界流行一句话叫“未来已来”，的确，时代变化、教育变化、成长变化日新月异超乎想象，语文学科必须更大、更深、更广，才能跟上这个时代。问题是，“大语文”这个旗，到底该谁来扛，是培训机构来扛，还是学校教育来扛；到底该怎么扛，课程如何与时俱进，体系如何上下贯通，视野如何左顾右盼。可能后者将会决定前者。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商业资本步入教育领域的时候，演员闫妮在其主演的电影《可爱的你》里质问培训机构老板的一句话——“Bowie，你是在做生意还是在办教育？我是一名教师，教师本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你明白吗？”值得所有的“大语文”人反复自问。

（摘自《光明日报》）

科技视野

□ 张佳欣

据《科学美国人》杂志，2020年12月8日，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了北极气候的年度报告——《2020年北极报告卡》。如果北极是“病人”，那么这份报告就是对这个庞大而重要的生物群落健康状况的全面“体检”结果：气温在上升，冰在融化，雪在消失，北极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演变。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高级研究科学家沃尔特·迈耶

北极正上演“冰与火”之歌

表示，现在不再是我们“是否”会在未来几十年内看到无冰北极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

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北纬60°以北的年平均地面气温至少达到了自1900年以来的第二高纪录。目前，北极地区的气温上升速度至少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北极正上演一场“冰与火之歌”：北冰洋正在变暖，格陵兰的冰盖加速融化，每年夏季整个苔原野火肆虐……

今年是北极圈野火创纪录的一个夏天。这主要是由于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接二连三的火灾，特别是在与拉普捷夫海接壤的萨哈共和国。

为北极大火提供燃料的大部分干燃

料来自死苔藓和土壤中积累的其他植物物质。冰冻的温度往往会阻止这些枯死的植物在冬天完全腐烂。当春天融化地面时，它们很快就会干涸。空气越暖和，春天就越早，它们干燥的速度也就越快。

此外，自80年代初以来，卫星一直跟踪着苔原的植被或北极的“绿色度”，这是北极气候变化的重要信号。自2016年以来，北美的“绿色度”已急剧下降，但在欧亚地区仍高于平均水平。报告发现，从完整的卫星记录来看，北极总体正朝着更“绿色”的方向发展，因为温度升高使冰冻的苔原融化，灌木和其他植物物种在过去无法生根的地方生长。

气候变化也在影响北冰洋的动植物，从食物链的最底层开始。微小的藻类是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石。额外的食物对北冰洋的一些动物来说是一种恩惠。今年的北极“体检”报告中称，北极的弓头鲸数量近期有所增长。科学家们认为，这些增加可能与增加的藻类有关。

此前，也有报道称，永久冻土覆盖了地球陆地表面的24%。在北极的一些冻土中，可能含有古老的冰冻微生物、冰川世的巨型动物，甚至还有被埋葬的天花受害者。随着永冻土的融化速度越来越快，科学家们面临的新挑战是发现和识别可能正在被“搅动”的微生物、细菌和病毒。

（摘自《科技日报》）

天价薪酬为什么砸不出好球

□ 陈华

“还不觉醒，难道良心已死吗？”近日，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对球员天价薪酬犀利开炮，新出台的限薪令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俱乐部年度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国内球员年薪税前不超过500万元、外籍球员年薪税前不超过3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82万元)……

陈戌源用“潮水终将退去，我们将拥有一个洁净的海滩”描绘新改革的蓝图。2015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制定俱乐部人才引进和薪酬管理规范，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新政事关总体改革方案的落实，事关中国足球的改革大局，事关俱乐部健康可持续发展，事关人民大众的美好期盼。金元足球违背市场规律，违背价值规律，因而不可持续。”陈戌源说。

“金元足球”的产生，原是各大俱乐部重金引外援、囤国脚，一定程度上带火了中国

球市。可是，用钱烧出来的“虚火”并没有旺多久。数据显示，畸形“军备竞赛”下，中超俱乐部2018年平均亏损4.4亿元人民币，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2019年亏损额达19.4亿元。过去十年，大批地产集团用高投入追求高产，让本就收入不菲的中国球员群体，一举跨入“千万富翁俱乐部”。

然而，中国足球并未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成绩单。反而让足球市场滋生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影响了一代球员的精神面貌与价值观。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屡战屡败，和中超联赛资本开道的豪情万丈，形成强烈反差。不少人愤愤道：职业了，有钱了，水平却没了，这球还怎么踢？

足球要搞得更好，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到青训这个慢功夫上。同济大学教授、上海绿地申花俱乐部体育总监吴金贵表示，限薪政策背后，也有为了扶植中国本土球员留洋的“良苦用心”，割除金元足球的毒瘤，换一种方式来尝试提升中国足球，尤其是国家队的水平。

（摘自《解放日报》）

生活百科

当身体在遭受钝器外伤、心脏病、窒息和休克等危及生命的伤害时，会触发濒死体验(NDEs)。在医院中，1/10的心脏骤停患者有过类似的体验。成千上万的幸存者在经历过这一转瞬即逝的痛苦时刻后，都描述道：他们脱离了受损的身体，进入了超越日常存在的环境，不再受到通常时空界限的束缚。

濒死体验并非幻想。他们的经历还包括遇到活着或者已死去的亲人、伴侣或朋友，以及天使之类的精神形体；产生类似于普鲁斯特式的记忆回溯，甚至是回顾一生中好或坏的记忆；又或者对时空的感知出现扭曲。其中一部分感知现象，能通过生理学解释，例如逐渐变窄的隧道景象，是由于视网膜外周的血流量减少，导致视野周边的区域最先丧失视觉。

濒死体验可能是正面的，这种震撼的体验会将精神上的平静与身体遭受的巨大创伤分离，使人产生与宇宙合二为一的感觉。但是，并非所有的濒死体验都是喜悦的，有一些经历十分可怕，伴随着强烈的恐

惧、痛苦、孤独和绝望。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在濒死体验期间，认知功能增强与大脑功能受损同时发生的矛盾现象，解释为想象力的飞跃。研究人员对122位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做了问卷调查，要求他们比较记忆中的濒死体验与大约同一时间发生的真实事件和想象事件。结果表明，与真实或想象的情况相比，濒死体验的



濒死体验，会让大脑记住什么

记忆更加生动且细节更丰富。

许多神经学家注意到濒死体验与一类被称为复杂部分性发作癫痫产生的影响具有相似性。这类癫痫会导致部分意识丧失，通常会局限在某一脑半球的特定区域。它们的发作是有预兆的，这些预兆与病人自身的特殊经历有关。癫痫发作可能伴有对物体大小感知的改变，出现不同寻常的味觉、嗅觉或本体感觉，以及产生记忆幻觉、人格解体或狂喜的感觉。

无论是由自发性疾病引起，还是由外科医生的电极触发，异常的神活动模式

与主观体验之间这种直接的联系，支持它起源于生物学机制而非灵魂之类的超自然因素。濒死体验的起源可能也是如此。

为什么在失血和缺氧时，大脑要把挣扎着维持运作的体验当成积极、幸福而不是恐慌，这仍然是一个谜。然而有趣的是，人类也会在其他一些场合中获得极限体验，例如，在深度潜水、高海拔攀登、飞行、窒息或昏厥游戏等情景中，氧气的减少会带来让人欢愉的愉悦感、头晕目眩和高度兴奋。要真正了解濒死体验的生理机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摘自《科技日报》）

学林漫步

□ 赵染芹

古人在深秋的夜晚，没有了“卧看牵牛织女星”“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浪漫情趣，而是聆听“万户捣衣声”了。为什么？因为“九月授衣”。

对“授衣”的理解，古今大体一致：天气趋凉，制备寒衣。西汉初年注释《诗经》的《毛传》，就是这样解释“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而关于“捣衣”之意，现代人却一知半解。“捣衣”，即用水杵在砧板上捶击衣服。有人直接将“捣衣”理解为：月光洒满大唐帝国，征妇们便在月光下，把衣服放在砧板上，用水杵捶击，并且想当然地认为，“捣衣”就是古人的一种洗衣方法，洗衣时用棒槌捶衣便是由此演化而来。

幼时读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

古人“捣衣”不是洗衣

虏，良人罢远征”，也曾将“捣衣”理解为棒槌敲打衣服。其实，仔细阅读诗句便可发现，诗仙李白写的是秋凉来临时都城长安妇女们制备寒衣时的感怀。

古代的妇女在“良人”常年征战在边关的情况下，在日常生活中便以弱肩挑起家庭的重担，不仅能织布，而且会缝衣。唐代时，由于棉花还未传入中国，人们穿的衣服一般皆由葛藤和大麻、苎麻的韧皮纤维纺织而成。妇女织的主要是苎麻纤维布，苎麻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皮虽含很多纤维质，但剥出的丝较短，织布之前，必须将其接成长线，上织布机时为防止接口滑落再刷白米浆。因苎麻丝的拉力是蚕丝的七倍、棉花的八倍，又上了浆，所以这种布特别僵硬。由

此，在缝制衣服前要进行脱浆工序，使其变柔软，便于手工缝制，更能穿着舒服。

在生产落后的情况下，古人只能用手工办法将苎麻纤维布变软，“捣衣”的主要功能就是“脱浆去僵硬”，这个工序夜晚便可进行。如此这般缝制的衣物，自有它的“相思与温暖”。

而江南地区洗衣用棒槌捶击衣服，主要是为了“去污脱水”，一般把脏衣服先“浆水”，然后下水洗涤一两遍，再将衣服铺在池塘边或河溪旁平坦的石板上，用棒槌捶打，最后把衣服放进清水“淘”一次，拧干水。这个过程与“捣衣”发出的声音、韵味有着本质的区别。

（摘自《今晚报》）



“是非”有应有的洁癖。

无论如何，疫情风险应该被充分认知和应对，但对于伴生的，并且由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对他人的伤害，同样不能视而不见——其指向的对人心、对道德体系的“污染”，带来的破坏力可能不亚于病毒。

当然，由确诊病例信息所引发的对个人信息的过度解读和“深扒”，或许也应该引发思考：在疫情防控已经经过了最复杂的时期后，病例通报的个人信息部分应该公布到什么程度，如何尽量避免引发对个人隐私的“次生灾害”？

（摘自光明网）

警惕病毒带来的“次生灾害”

□ 朱昌俊

前段时间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确诊病例赵某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包含其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照片等在社交平台上被大量传播，有网友联系到其此前在多家酒吧的活动轨迹，而对其私生活大加挞伐甚至是谩骂。日前，针对“病例赵某个人隐私被泄露”一事，成都公安已介入调查，网传赵某朋友圈截图系冒用，当事人已报案。

毫无疑问，大家关心病例的活动轨迹是正常表现。但由于个人活动轨迹而自行对确诊病例的个人道德和私生活进行脑补“画像”，显然超出了合理限度，也未尝不是扭曲疫情防控的焦点。

应该明确的是，确诊病患本身也是受害者，在不违反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她的任何活动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都是个人自由。这一点，不能因为她成了确诊病例就有变化。从现实来看，一位20岁的姑娘有着丰富的休闲生活，这在千万级人口的大

都市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因为她被确诊了，就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她的行为，甚至想当然地对其个人私生活“贴标签”，这已经构成对个人权益的侵犯，陷入了群体性的窥私狂欢之中。

当前，公布个人活动轨迹已经成为疫情防控的标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确诊病例配合流调，如实告知自己的个人行程和生活信息，并在防控部门的统一规范下公开，依然是一种个人隐私权的让渡，而非彻底否定隐私权，并且其公开程度也只服务于疫情防控的必要需求，有着明确的边界。换言之，任何突破这种边界的“扒私”行为，都已经越界。

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的重新定义了诸多行为的边界，但有些逻辑，有些常识依然成立。比如，对于不实的信息、一点传播和添油加醋、对于遭遇疫情的个体多一点同情、对个人隐私权有起码的尊重、对于陷入网络暴力的个体多一点恻隐之心等等。这是在提醒每个人，应该有意地避免成为“加害者”，对“真相”有起码的辨别能力，对

文化记忆

□ 海潮

电子产品如此发达的今天，电视机早已不是家庭必备之物。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台机器搬离我的生活，我根本舍不得失去它。

见过的第一台电视机，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家所在的小县城，有电视机的家庭寥寥无几。那年，我们厂里却买了一台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放在会议室。每天晚上7点，《新闻联播》开始，会有专门的管理人打开会议室的门，打开电视机。

门一开，早已等候的人群便涌进去，顷刻间会议室便满满当当。大人挤挤挨挨地坐在排椅上，小孩子要么拥在大人身边，要么干脆腿插缝针地坐在地板上。那时我年纪还小，压根看不懂《新闻联播》，却也看得专心致志，仅是电视机和画面、声音，就足以让我感到新奇。而晚饭后早早跑去厂院等候会议室开门，则是院里很多孩子童年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1984年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播放时，刚8岁的我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剧情。能记住的，完全是因为画面中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幸子和光夫，那一对让人惊讶的美好面容。但《血疑》几乎吸引了院里所有的孩子，比如我哥，还有邻家的宋姐姐。

宋姐姐和我哥相同的年纪，读了高中，平日里住校，周末才能回家，并没有时间像我这样每晚牢牢守着电视机，守着那两张天使般的面孔。所以，每个周六回来，宋姐姐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踩着凳子趴在我们两家之间的院墙墙头喊我的名字。我总会飞快跑过去，踩上院墙这边的椅子，趴在那里头对头地给她讲述《血疑》的剧情。

后来，我爸拿出家中全部积蓄，又借了亲戚的钱，买回了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也是那一年，家属院陆续有几户人家买了电视机，基本上都是14英寸和17英寸的黑白机器，而彩色电视，依然只有厂会议室那一台。

于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家

光影里的那段岁月

和其他有电视机的人家，分流了聚集在厂会议室里的电视观众，大家根据居住方位选择去谁家看电视。

每晚7点左右，我们家便陆续开始来人，大多是女人和孩子，男人还是会选择去厂会议室，哪怕多走一些路。为此，我家要赶在7点前吃完晚饭，我爸还特意去集市买了十几把简易的折叠板凳。家中俨然就是一个热闹的小影院，我妈要烧很多水。

大家就那么一起拥挤、热闹地看了很多剧，《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篱笆女人和狗》《趟过男人河的女人》……

但那时候最难的，是信号问题。天线好像总是不太好，立在房顶，一阵风便会吹得失灵。我哥或其他手脚麻利的男孩子，不得不一次次踩着梯子爬上房顶去转动天线。

前不久，我和我妈一起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看到影片中有个小孩子在屋顶转动天线的画面时，年近八旬的妈妈，突然就湿了眼眶。

再后来，有电视机的人家越来越多，家里的观众渐渐只剩了我们自己一家人。我念高中住校时，哥哥早已工作住到了单位宿舍，家里虽然换了大的彩色电视机，观众也只剩下爸妈两个人了。就在我高中毕业那年，邻居家的宋姐姐成了我的嫂子。她的嫁妆里，最显眼的，是一台硕大的彩色电视机。

数年之后，我也在外地有了自己的家，曾经的家中只剩了渐渐年迈的爸妈。电视机，成了他们最忠实的陪伴者。

我爸退休后开始痴迷于各种战争片，据我妈说，有好几部，他反反复复看了不下几十遍，不论哪个频道重播，他一定坚守。

我妈则始终如一地迷恋于戏曲频道的京剧栏目，那些经典的传统剧目，回看的次数绝不亚于我爸对战争片的执着。而这么多年，我若独自在家，也会下意识地打开电视机，随便挑一个频道，比如清晨的新闻、午间的法治或夜晚的剧场……也并不很专心地看，只是在电视机流淌出的声音里，做着手边的事，过着我的烟火人生。（摘自《品读》）